

# 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重塑:困境与解构\*

毛华兵 夏卓然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劳动者主体性面临的困境已成为当代文明进步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平台借助算法模糊劳动边界、制造虚假认同,使数字劳动者遭受双重剥削,陷入劳动异化与主体性迷失的危机。究其根源,在于平台利用技术权力构建系统性压迫框架:劳动自由的幻象掩盖了实际的权力控制,平台话语的意识形态规训持续消解数字劳动者的批判意识,数字化生产模式则通过算法规则加剧了主体的异化程度。对此,需以资本规制与技术伦理为基点,通过平台生态治理切断剥削链条,以人本导向重塑数字技术逻辑,唤醒主体意识重构劳动者的价值认同,最终在保障劳动权益与分配正义的过程中,推动数字劳动者实现从“异化生存”到“主体性复归”的范式转换。唯有将数字技术从平台逻辑中解放,重建“劳动者—技术—社会”的辩证发展模态,才能推动马克思“人的解放”愿景在数字化时代的实践转化。

**[关键词]** 数字劳动者; 主体性; 平台; 数字技术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2-0001-08

## 一、数字技术二重性的主体反思

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重构了全球劳动秩序,平台经济、算法管理与数据商用的深度融合,使数字劳动者陷入“自由劳动”假象下的主体性困境。当前学界对此有两种对立的观点:技术乌托邦主义主张零工经济将促进劳动自由,却忽视平台对数字劳动的时空渗透;数字异化论揭露了算法对数字劳动者的认知与情感控制,却陷入了技术决定论陷阱。这两种观点均未触及问题的本质——数字劳动者主体性困境究竟从何而来、因何产生?这种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又该怎样纾解?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回归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穿透技术善恶之争的表象,从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在数字技术时代的再生产视角出发进行审视。

马克思指出,机器体系作为过往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sup>[1]743</sup>。这一批判在数字化时代展现出新的理论张力。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并未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框架,反而成为削弱劳动者主体性的精密工具。传统机器仅支配工人肢体,而平台通过实时定位与行为预测,将劳动者的生理行为和心理活动全部纳入算法体系。也就是说,从肢体支配到思想规训,从情感的异化到存在意义的模糊化,平台正在通过数字技术介入劳动过程,对人的本质力量进行全方位征用。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3&ZD200)。

[收稿日期] 2026-01-12

[作者简介] 毛华兵,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夏卓然,女,湖北黄石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数字劳动者当前的困境,实质是平台将数字技术转化为牟利工具,通过占有数据与算法对数字劳动者主体性的剥夺。立足马克思唯物史观审视这一困境,具有双重革命性意义:既要揭露算法背后的劳动榨取实质,也要在社会形态的演进中探寻解放可能。当数字劳动者意识到困住他们的不是算法本身,而是被平台垄断的技术应用方式时,主体性的觉醒便有了现实根基——这不是对数字技术的简单拒斥,而是对“技术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的追问。唯有将技术发展从平台逻辑中解放,重建“劳动者—技术—社会”的辩证发展模态,才能实现马克思憧憬的“人的解放”在数字化时代的创造性转化。

## 二、数字化时代劳动者的主体性困境

在数字化时代,生产资料、劳动成果以及社会信息均以数据形式迅速传播,推动了数字资源的广泛共享,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sup>[2]</sup>。然而,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红利并未惠及广大数字劳动者,平台利用数字技术,不仅加深了对数字劳动者物质生产的剥削,更进一步渗透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 (一) 数字劳动者沦为“自由的数据佃农”

在数字化背景下,平台作为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结合体,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个人的数字生活体验,另一方面也无形中消弭了数字劳动的边界,使数字劳动者从机器附属品降格为自由的“数据佃农”。

数字平台的全域扩张,打破了传统劳动的空间区隔。平台通过媒介优势瓦解了传统劳动在物理空间上的界限,将街道、家庭、咖啡馆等离散的生活场景编织成连续的数据生产场域,数字劳动者在休闲娱乐的外观下进行无偿的认知劳动与情感劳动,其生命空间全部暴露于算法之下。这种空间重构实质是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当代变体,用户在互联网中让渡个人信息以获取平台媒介使用权时,平台也通过大数据将用户的信息检索、内容生产、社交互动等日常行为深度商品化,并构建起以流量为核心的剩余价值新形态。这种渗透不仅侵占物

质生产领域,更将情感劳动与认知劳动悉数纳入平台增殖体系。正如哈特与奈格里所揭示,“图像、信息、知识、感受、符码以及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过程中,都超越了有形商品或者商品的物质性层面。”<sup>[3]105</sup>。

数字劳动的全时特征,模糊了劳动与娱乐的时间界限。传统资本通过延长工时占有劳动者的显性劳动时间,而数字平台正在通过泛娱乐化的意识形态包装,将数字劳动者的社交、消费乃至时间全部转化为潜在剥削对象,劳动时长已提升至人身体可能性的极限。Digital 2025 研究显示,截至 2025 年 2 月,全球社交媒体用户数量为 52.4 亿,典型的网络用户每天花接近 7 小时使用互联网进行线上活动<sup>[4]</sup>。随时接入网络意味着随时生产有价值的信息,平台的逐利本性使其“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sup>[5]199</sup>。“隐形工时”的延长和劳动内涵的拓展正是相对剩余价值的数字表现形式。数字劳动者看似在享受休闲时光,实则全天候服务于平台增殖,陷入自发性过劳而不自知。长此以往,“个人全部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sup>[5]200</sup>。

数字劳动的全员趋势,扩大了平台的剥削范围。随着数字劳动的门槛进一步降低,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如今也可以自主进入劳动市场。看似“全民参与”的劳动盛况背后,恰恰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sup>[1]269</sup>的论断。平台借“灵活就业”“数字创业”等话术将非正式劳动包装为个人奋斗叙事,利用所谓的“自我价值实现”掩盖自身的双重获利机制:一方面,广泛的参与性为平台提供了足量的剥削对象,使其能够通过分摊用工成本、拉长结算周期等手段来压缩数字劳动者的收入空间;另一方面,平台通过“去劳动关系化”的规则设计将大部分数字劳动者抛入社会保障真空,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的雇主责任。依托平台进行劳动的自由职业者、兼职者和小微企业主,往往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面临着收入不稳

定、工作环境缺乏安全保障、健康风险增加等多重挑战。

## （二）数字劳动者陷入“虚假的认同归属”

在数字化时代,平台将商品经济的内容包装成各种信息产品和线上服务向数字劳动者精准推送,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数字劳动者既可自由便捷地享受着数字化时代的便利,却也在无形中困入平台打造的虚假“认同归属”,不自觉地成为平台牟利的工具。

平台借助数字应用,在碎片化信息生产中实现对数字劳动者思维能力的剥夺。为了维持用户的互动频率与在线时长,平台将复杂的思想体系简化为易于消费的“信息快餐”,导致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在快餐文化中日益萎缩成单向度的数据投喂。长此以往,碎片化信息瓦解深度思考能力,娱乐化内容消解批判意识,数字劳动者抛弃了对严肃内容和真实社会交往的需求,在信息洪流中失去辩证把握世界的的能力。

平台通过信息引导,在虚幻共识中对数字劳动者进行意识形态规训。数字化时代,平台作为信息审核终端会依据盈利需要对海量信息进行整合收编,形成了一种看似多元实则单一的意识景观,使数字劳动者陷入“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sup>[6]195</sup>的认知假象。在平台的景观牢笼中,流量逻辑推翻了原有的价值判断标准,价值增值的尺度撼动了道德与人性的尺度。这一过程不仅削弱了个体思想多元性与文化多样性,更可能导致社会共识瓦解与信任危机。

平台利用算法追踪,在全天候数据监控中实现自由表象背后的真实奴役。通过实时记录数字劳动者的浏览偏好、社交范围与情感倾向,平台将个人线上活动轨迹转化为“可计算的意识图谱”,并依托大数据推送定制内容,从而获得超额收益。这种看似贴心的个性化服务实为隐性精神控制,用户表面上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实则平台设计下一步步走向消费主义与娱乐至上的深渊。

## （三）数字劳动者遭受“内与外双重剥削”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sup>[5]467</sup>,这一本质在数字技术加持下演化出更为复杂的表现形式。平台通过重构数字劳动过程,将马克思揭示的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升级为“数据化剥削”与“自我剥削”的双重体系,形成对数字劳动者主体性的隐秘剥夺。

数据化剥削是平台价值攫取机制的新升级。平台借助算法完成对传统剥削范式的技术改造,推动劳动对资本由形式从属(资本控制劳动结果)向实际从属(资本支配劳动全过程)转变。具体表现为二重机制革新:其一,劳动控制的算法化。平台借助算法系统实现对劳动过程的精确控制,使平台收益呈现为技术赋能的自然结果。外卖骑手的路径规划、线上商家的接单流程均由算法编码为系统指令,平台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隐性增加劳动强度,数字化生产模式遮蔽了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实质。其二,生命活动的商品化。平台通过技术手段突破传统剥削边界,将线上客服的服务量化为“满意度指数”,社区成员的互动解构为“传播节点”,人的情感、社交、生物特征甚至生命活动皆可转化为数据生产资料,数字劳动者由出售体能与技能的劳动力商品向“生命商品”转变。这种数据化剥削机制的高明之处在于,平台的技术优势压缩了劳资谈判空间,数字劳动者若想使用平台必须默认规则。数字劳动者产生的行为数据源源不断反哺算法,形成“数据积累—权力强化—价值榨取”的剥削闭环,导致“数字劳动者生产的数据越多,自身就越贫困”的悖论。

自我剥削是数字劳动者主体异化的新形式。数字技术的平台化使用深化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更通过算法将平台意志内化为主体的“自我意志”,数字劳动者在被剥削的同时也陷入主动自我剥削的泥潭。平台通过弹性雇佣关系模糊了传统工厂在工作与生活上的区隔,将价值获取机制由生产领域扩展至生命政治领域。网络主播为维持“打赏排行

榜”全天候无休直播,视频博主为追逐“爆款”进行夸张表演,这些看似自主的劳动选择,实则是平台为数字劳动者量身打造的“自愿性强制”,带来主体在认知层面和存在层面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平台通过虚拟画像和大数据推荐,引导数字劳动者将算法设定的量化指标等同为自我实现的标准。数字劳动者在追求完美数据的幻象中陷入数据拜物教的陷阱,迷失对生命意义和人本质的理性认知。另一方面,数字劳动者为了维持诸如平台账号权重、信用积分等数字形象的生存资格,被迫将生命活动降格为数据迭代过程。主体的作息规律和身体状况服从系统调度,社交态度、情绪表达和价值认同由算法逻辑主导,数字劳动者丧失对自身劳动能力和创造力的掌控,陷入“存在性贫困”而不自知。

数字化时代的自我剥削并非个体理性选择,而是平台通过技术中介重构劳动控制形式的必然结果。平台通过将数据化剥削机制嵌入日常数字实践,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渗透,迫使数字劳动者主动出让劳动自主权进行自我剥削,双重剥削构成数字劳动者异化的新形态。

### 三、数字劳动者主体性困境的生成原因

数字劳动者对平台的深度依赖赋予了平台对个体生命进行规制的权力。正如马克思预见的那样,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强化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当前数字技术体系的大规模使用更是深化了资本对劳动的实际控制,只不过这种控制变得更加隐蔽且难以觉察。

(一)劳动自由的假象掩藏着平台实际的权力控制

在平台逐利逻辑的统摄下,劳动自由的本质是平台通过技术物化机制对数字劳动者主体性的深度控制。数字劳动者在灵活就业与智能算法中体验自由的同时,也是平台通过数字生产将劳动过程从形式吸纳转向实质吸纳的过程。

一方面,在灵活就业的表象下,劳动自由实际成为平台盘剥数字劳动者的掩护。平台

通过任务分解与算法调度,将复杂的技能劳动简化为可标准化操作的单项任务,导致数字劳动者失去了对生产过程的整体把握,从大机器时代“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sup>[1]557</sup>降格为数字化生产体系里“单纯的活的附件”<sup>[5]186</sup>。这种去技能化通过“技能贬值—收入下降—平台依附”的循环,使他们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更差的工作条件和更苛刻的就业规则,既无法获得稳定就业保障,又被迫承担技术升级后被淘汰的风险。数字劳动者逐渐“失去任何独立的性质”<sup>[7]38</sup>,他们只有成为平台的手段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劳动只有依附于平台才有生产意义。这不是主体对自由的重新占据,而是平台在更深层次上占有了主体及其劳动。

另一方面,平台通过智能算法的柔性剥削,诱导数字劳动者主动提高劳动强度、进行自我规训。在雇佣场景中,数字劳动者为了追赶大数据测算的效率标准不得不持续突破生理极限,否则就可能失去账号的使用资格。平台制定的劳动流程与激励机制看似公平合理,实则促使数字劳动者于自愿劳动中陷入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双重剥削。而在非雇佣场景中,平台则利用视听刺激不断吸引用户注意力,潜移默化地搜集用户足迹并完成商业化利用,使劳动者在自主使用中完成价值增值。这种柔性剥削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将劳资关系中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数字劳动者与大数据算法的博弈,从而掩盖了平台对劳动生产的占有事实。

数字劳动者对于平台权力的认知误区,成为其主体性困境的又一重要因素。平台通过算法对劳动强度进行动态调整,将工作日的内涵与外延利用到极限,形成数字化时代的“血汗工厂”。数字劳动者却沉浸在平台所营造的自由与个性幻境中,对平台的真实意图与剥削本质缺乏清醒的认知。更为严峻的是,数字劳动场所的分散性和独立性,使得“被疏离和分化的主体难以形成一定的凝聚力”<sup>[8]</sup>,从而削弱了劳资矛盾中的抗争力量。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操控下的技术体系已经沦为马克

思所讥讽的“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sup>[1]422</sup>，非但没有从根本上减轻数字劳动者的身心负担，反而促成剥削模式的数字化转型与剥削强度的隐秘提升。

## （二）平台话语的规训削弱数字劳动者的自主意识

平台的发展不仅重塑了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形态，更深刻影响了数字劳动者的自我认知与主体性构建。数字景观与全景监控相结合，共同形成了数字劳动者的虚假自我意识，进一步加深其主体性困境。

一方面，数字景观将商品拜物教发展为数据拜物教。数字景观作为平台精心设计的意识形态幻象，将数字劳动者的社交、创作等实践活动均抽象为可计量的流量数据，使他们不自觉地将平台的数据规则内化为自我价值判断标准——这种符号形式的普遍化作为“商品形式神秘性”的升级，把劳动的社会属性物化为数据的增殖运动。另一方面，全景监控借助生物识别与物联网技术，通过对数字劳动者的生理指标和行动轨迹等生命活动进行实时捕获并评估反馈，将传统规训权力升级为全天候的数据控制。二者的结合构成平台从劳动过程到生命政治统治的闭环：数字景观用“流量即价值”的幻象掩盖剥削本质，全景监控则以技术强制确保劳动过程的可控性，直至将数字劳动者降格为算法指令的机械执行终端。这种平台形态“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sup>[9]163</sup>，数字劳动者不仅失去劳动产品的支配权，其生命活动本身也沦为资本谋利的数据原料。

平台经济通过数字技术达成深度控制，将数字劳动者对平台的依赖转化为对平台话语权的默许与认同。马尔库塞揭示的“技术合理性掩盖统治本质”的批判在数字化时代获得新表现。平台以“自由选择”和“效率优化”为名，将算法规训内嵌于数字劳动者的认知结构，其实质是通过流量指标与行为追踪的双重机制将人的主体性抽象为可控变量。数字劳动者的个性表达与创造性实践被简化为算法指令的标准化输出，所谓成功与幸福不过是平

台价值符号的再生产过程。这种统治的彻底性在于，以平台为主导的技术和控制已经深入到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全过程。一旦脱离平台，人们可能会面临信息孤立、社交障碍乃至生存困境。数字劳动者越来越“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sup>[9]580</sup>，被异化为平台生态系统的寄生性存在。他们看似获得了数字世界中的无限链接，实则被困于平台增殖的数据牢笼。这种异化存在不仅削弱了人的主体意志，更在宏观层面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物化结构，将技术民主化的可能性转化为巩固平台统治的工具，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远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

## （三）数字化生产模式加剧数字劳动者的主体异化

生产力的增长如果没有相应地带来生产关系的改善，就会加剧剥削的严重性。在数字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数字化生产打破了传统生产的时空桎梏，已迅速崛起为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与此同时，数字劳动者却陷入更为严峻的剥削现实之中。这种剥削潜藏在数字化生产模式的光鲜外表下，对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和基本人权构成了极大挑战。

数字化生产模式加剧了数字劳动者同自身劳动成果的异化。一方面，数字劳动成果多以数据、代码等虚拟形态存在，高度的抽象化和不可见性削弱了数字劳动者对自身创造物的直观感知和联系；另一方面，平台通过服务协议将劳动成果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收归平台统一运作，进而优化算法系统、重塑劳动规则，导致“劳动条件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与工人相对立”<sup>[1]378</sup>。网约车司机的行驶数据用于训练无人车智能驾驶大模型，内容创作者的流量托举平台生态吸引更多竞争者，数字劳动者不得不与自己创造的数据对抗。在这种不对称的生产分配机制下，“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sup>[9]157</sup>。只要劳动仍为平台增值服务，这种异化便会持续深化，技术的发展只会加速这一趋势。

数字化生产模式也在无形中推动了数字

劳动者社会关系的异化。从社会参与角度看,数字劳动者大多专注于高度精细化的数字分工内容,这种单向度的信息环境削弱了数字劳动者对公共事务和现实问题的关注,使其对社会运行图景的理解渐趋片面化。长此以往,数字劳动者可能丧失对社会发展的参与意愿和能力,成为社会进步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从公民身份角度看,数字化生产模式可能导致数字劳动者的社会身份边缘化。平台中的数字劳动者往往被视为“经济人”,他们的价值和地位取决于所提供的劳动量和服务质量,而非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和责任。在平台评级系统的驯化下,数字公民身份被平台规则遮蔽,导致他们对社会规范和公共价值观的背离,成为社会的游离者而非建设者。平台消解了数字劳动者对自身社会性本质的主体认知,其社会角色日益边缘化。

此外,数字化生产模式还带来了劳动价值的扭曲与阶层固化现象。平台将诸如线上的具体劳动简化为可通约的抽象劳动时间,通过将全体劳动纳入计时计价体系,掩盖了不同劳动形式的社会必要性差异,使价值创造服从于平台算法的效率参数。数字劳动者被迫卷入无休止的量化竞争,实际贡献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仅能获取与其劳动付出极不相称的少量报酬,导致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日益下降。更为严峻的是,平台通过技术中介重构了劳动力市场的等级秩序。随着数据密集型行业的扩张,数字资源价值密度显著提升,平台所有者的技术优势越发凸显。技术壁垒与数据垄断构筑的新型藩篱抑制了数字劳动者的创新活力,降低了社会资源的流动性,形成“数字鸿沟”下的社会分层现象。数字化生产模式中的劳动价值萎缩与阶层流动阻滞这一双重过程,不仅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也使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矛盾愈发尖锐。

#### 四、数字劳动者主体性重构的路径

平台与技术共谋导致的主体性困境本质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数字化表达。要破解这一困局,需回归马克思的理论愿景,使数字技术从平台牟利工具转化为人类解放手段,才

能终结“用自由时间生产锁链”的异化循环,在数字化时代重建公平、正义的劳动关系,促进数字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与真正的自由解放。

##### (一) 引导平台健康有序发展

在审视数字资本对现代社会的塑形作用时,应坚持其“二重性”立场:其一,资本作为推动生产力跃迁的历史性力量,具有显著的革命性与进步性;其二,逐利逻辑又容易引发劳动异化与人—物关系的颠倒,客观上侵蚀数字劳动者的正当权益。由此,反对平台霸权并非否定平台经济的合理性,而是需在制度框架内加以规范与校正,使其沿着健康有序的轨道运行,从而实现数字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回归。

第一,强化法律制度约束与规范。为稳固平台生态的良性发展,应加快完善相关立法与配套规章,清晰划定平台经营与用工的行为边界;同步提升市场与金融监管的执法强度,严惩操纵市场、恶意扩张等不当行为;实施有力的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维护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健全劳动监察体系,针对用工、报酬、工时、社保、职业健康等关键环节开展常态化监管,切实保障数字劳动者的法定权利。第二,构建规范化体制机制引导健康发展。为确保平台在合法合规轨道上运行,应形成与之匹配的制度组合: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累进税制、差别费率等经济杠杆优化资本流向,鼓励投入人力资本与公共技术基础设施;以“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合规指引”明确鼓励与禁止事项,提供从准入到退出的全流程规则坐标,使平台发展更好契合数字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合理期待。第三,推进法治化治理与机制化引导。面向数字化时代,建立“技术—法律”协同的现代规制体系,通过立法完善、司法适用与执法升级实现全过程监管;充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数字治理工具箱,综合运用财政杠杆、清单管理与风险评估等手段,搭建“政府—平台—工会(或行业组织)”三方协作机制,在议题协商、规则共制与信息共享中提升治理效能,推动平台规范运行。第四,实施结构性制衡与反垄断调查。为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国方案”,需在结构层面对平台实

施制衡:实行分级分类监管与动态合规管理,针对网络效应强、数据壁垒高的领域设置更高强度的竞争政策工具;推进平台生态重塑工程,疏通互联互通、数据可携与接口开放等关键环节,防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维护良性竞争秩序,并以此更稳固地托举数字劳动者的权益保障。

## (二)重建数字技术伦理

尊重并保障数字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既是对技术初心的坚守,也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应从技术实践、政策供给与社会文化等层面同步推进系统性变革,使数字技术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在人—技—制三者协同中实现良性互动,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可持续、有温度的数字社会。

数字化治理范式亟须由单纯的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在技术实践层面,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要把数字劳动者的参与与贡献置于应有位置。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不仅要追求性能与效率,也要评估社会影响与人文关怀。应建立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提供多样化学习资源与实践场景,持续提升劳动者技能与创新能力;完善职业发展通道与晋升规则,明确能力评价与成长节奏,使数字劳动者在技术变革中获得更大的能动性话语权。在安全与可靠方面,应同步强化技术研发与监管,确保系统稳健运行与职业健康安全。具体包括:完善数据保护与网络安全制度,严防技术滥用与隐私泄露;推动数字伦理与职业规范的普及与执行,将算法可解释、可追责、可审计纳入基本要求;健全职业健康监测与心理支持机制,针对高强度、碎片化与无界化劳动特征,为数字劳动者提供切实有效的身心支持,缓解技术更迭带来的压力。在开放与共享方面,应打破技术壁垒,优化要素配置与跨域流动。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动规则衔接与经验互鉴;鼓励企业、科研机构与高校开展深度协同,共建共用基础性平台与关键共性技术,支撑产业升级与场景落地;同时完善收益分配与激励机制,把数字劳动者在流程改进、内容创造与数据治理中的实际贡献纳入分配

体系,确保其在技术成果中的合理回报。

## (三)唤醒劳动者的主体意识

塑造数字劳动者的主体认同,是一项跨越个人成长、组织建构与社会支持的系统工程,需多元主体协同发力。通过提升数字劳动者自身能力,营造支持性的企业文化,塑造尊重劳动的社会氛围,方能为其提供更加公平、公正、和谐的发展环境,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协同增进。

首先,劳动者的自觉与成长是关键环节。数字劳动者需要明确自身在数字劳动中的主体地位与内在价值,辨识所处环境中的挑战与机遇;既要夯实专业技能,又要锤炼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形成面向不确定性的学习—实践—再学习闭环,主动适应数字技术的高速迭代。同时,应重视心态调适与心理韧性建设,在快节奏、高强度与边界模糊的工作情境中进行时间管理与情绪管理,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其次,企业应承担塑造主体认同的直接责任。企业有必要提供系统化培训与可持续的职业发展机会,帮助数字劳动者提升技能与就业竞争力;要建设包容、开放、鼓励创新的组织文化,完善激励与评价机制,确保劳动成果获得公正确认,通过合理薪酬、福利与成长通道满足数字劳动者的合理诉求。在这一文化与制度的双重支撑下,数字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力与协作意识得以释放,主体性也更具稳定性与自主性。最后,构建支持主体认同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政府应完善相关政策工具,强化劳动法对新业态的适用与执行,将数字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障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其权利获得感与制度可及性。社会各界需加大对数字劳动者的关注与支持,通过媒体传播、公益项目与社会组织的介入,提升公众认知,营造尊重劳动与创造的社会氛围。通过上述系统性安排与持续优化,数字劳动者可逐步完成从“算法附庸”向“技术主体”的转变,在实现个体发展的同时,推动数字经济朝着更为

## (四)实现数字劳动成果的合理分配

数字劳动保护的政策体系应当在法律规

范、监管执行、集体协商与工会建设、数据与隐私安全、职业发展与社会保障等维度同步发力,形成相互支撑的制度组合,以切实维护数字劳动者合法权益,推动数字经济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首先,以完善法律法规为根本。应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与配套规章,明确数字劳动的定义、类型及适用边界,确认数字劳动者的法律地位与权利清单,使其享有与传统劳动者等值的法定保护;同时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清楚界定其作为用工方在劳动条件、报酬支付、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法定义务。其次,着力提升监管与执法效能。强化专门监管机构,开展对数字劳动市场的常态化检查与评估,督促平台严格遵守劳动法规与行业标准;对违法用工、超时加班、拖欠工资等行为实施快速查处与联合惩戒。健全便利的投诉举报机制,完善受理—调查—反馈—救济闭环,并对积极举报者给予必要的保护与奖励,形成社会监督合力。再次,推进集体协商与工会建设。鼓励平台与数字劳动者围绕工资水平、工时安排、休息休假、职业健康等重点议题开展平等谈判,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支持数字劳动者依法成立工会或新型行业组织,提供法律援助、经费支持与能力培训,增强其议价能力与自我保护能力,使劳动者能够以组织化方式参与规则制定与利益分配。在数据保护与隐私安全方面,应完善相关法律与技术标准,明确平台在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存储与传输环节的合规职责与问责机制;提高劳动者数据权利意识,畅通维权渠道,鼓励对侵权行为依法举报与追责。围绕职业发展与社会保障,由政府与企业协同建设面向数字劳动者的职业培训体系,提供多层次课程与实践机会,提升其技能与创新能力;建立明确的晋升通道与评价标准,拓展职业上升空间;将数字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完善缴费方式与待遇接续,稳步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与抗风险能力。

数字化生产方式并未消解马克思所揭示

的资本与劳动矛盾,而是以数据占有、算法规训与平台组织形态将其“再编码”为更具隐蔽性与渗透性的统治机制。从数字技术二重性出发,我们可以知道数字劳动者主体性困境的核心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技术被平台资本垄断性配置并嵌入增殖逻辑。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重塑是一场以权利重建为支点、以技术再嵌入社会为路径的现实斗争。只有将数字技术从平台逻辑中解放出来,塑造“劳动者—技术—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在数字化时代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使人的解放由理论愿景转化为可检验、可持续的制度实践。

#### [ 参 考 文 献 ]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刘皓琰,李明.网络生产力下经济模式的劳动关系变化探析[J].经济学家,2017(12):33-41.
- [3]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M].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4] 亿欧智库.破圈与共生:2025中国社交媒体全球化发展报告[R/OL].<https://wearesocial.com/cn/blog/2025/02/digital-2025-the-essential-guide-to-the-global-state-of-digital/>.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高天驹.从“他者剥削”到“自我剥削”——数字时代下异化劳动的新表现[J].天府新论,2021(5):33-40.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王遐见)

# 马克思的劳动本体论探究:生成逻辑与基石效应\*

杨丽珍 赵 瑞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 马克思在哲学史上首次将劳动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提升到哲学的首要地位,创立劳动本体论,并将其引入人学观、历史观、自然观、认识论、宗教观等,成为其全部哲学理论的基石,从而创新性地揭示了人学之谜、历史之谜、自然之谜、认识之谜、宗教之谜。马克思的劳动本体论,不仅超越了西方传统本体论,而且有力驳斥了长期以来不绝于耳的关于马克思仅仅是经济学家而不是哲学家的论调。

**[关键词]** 劳动; 本体论; 人学观; 历史观; 自然观; 认识论; 宗教观

**[中图分类号]** A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2-0009-09

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近30年左右的探讨,于20世纪末、21世纪之交达到高潮,最近10年来关注甚少。综观20世纪80年代至今40余年的研究状况不难发现,学界关于马克思本体论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哲学有无本体论。有的认为没有,有的认为有,更多的学者似乎从未考虑过这一问题。二是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具体所指。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可谓五花八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如下几种:劳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社会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物质本体论。这些看法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总体上讲,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尽管没有明确谈及本体论,但综观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联系,不难发现其深刻的本体论思想。马克思的本体论实质是劳动本体论,而不是其他形式

的本体论;马克思不仅对劳动本体论予以一般性表述,还将其贯彻于人学观、历史观、自然观、认识论和宗教观等哲学思想中,使其成为一个系统性的有机整体。

## 一、劳动本体考辨:马克思劳动本体论的生成逻辑

马克思的本体论是立足于现实的人的劳动即物质生产活动对西方传统本体论进行批判的产物。其中,批判是手段,建构是目标。

### (一)西方传统本体论的历史沿革

西方传统本体论源自古希腊本体论(即ontology)。古希腊本体论意指“把系词‘是’以及分有‘是’的种种‘所是’(或‘是者’)作为范畴,通过逻辑的方法构造出来的先验原理体系”<sup>[1]3</sup>。古希腊本体论在巴门尼德哲学中最初发端,柏拉图哲学中初步发展,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正式诞生。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3&ZD200)。

[收稿日期] 2026-01-15

[作者简介] 杨丽珍,女,湖北罗田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 瑞,男,内蒙古阿拉善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门学科,它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和由于本性而属于它的那些属性”<sup>[2]473</sup>,首次提出第一哲学是研究本体“是”的学问,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们将本体“是”归结为“上帝”,近代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则将本体“是”归结为“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均建立在绝对精神的基石之上,标志西方传统本体论发展到完备状态。

西方传统本体论的基本特点是:主张在万事万物之上,有一种不变不动、自本自根,同时又派生万物、决定万物、推动万物的神秘的精神力量,这种神秘的精神力量就是最抽象的哲学范畴“是”,“是”为最高知识,即第一性的东西,是感性世界的本质和根据,对感性世界起决定作用,实质是一种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

## (二) 马克思的劳动本体论的生成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本体论是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哲学区别于其他各门具体科学的显著标志,也是哲学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根基。没有本体论,哲学是一盘散沙;没有本体论,哲学是肤浅的;没有本体论,将无真正的哲学;而没有科学的本体论,将无科学的哲学,所以要颠覆和超越西方传统哲学,须从本体论开始。

马克思立足现实的人的劳动,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对西方传统本体论进行了根本性的颠覆和发展。马克思认为,西方传统本体论的合理性在于它重视从变动不居、转瞬即逝的现象、杂多中寻求一般性、本质性、规律性的内容,但其严重局限是当它从诸多现象中抽取一般性、本质性、规律性的内容之后却枉顾事实,将之与现象、杂多彻底剥离,并进而臆想一般性、本质性的内容凌驾于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之上,即凌驾于万事万物之上,并创造超越宇宙万物的、自本自根的、创造一切的神秘的精神力量。它完全颠倒了事物的本真联系,是一种头足倒置的神秘主义哲学,经不起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的检验,在现实生活面前不堪一击。马克思对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上帝本体论以及西方传统本体论的

典型样态——黑格尔本体论的批判足以证明这一点。

基督教神学所鼓吹的上帝创世说(简称创世说)本质上是以西方传统本体论为哲学依据建构起来,因而其本体论可称为上帝本体论。上帝本体论鼓吹在这个世界之外,有一个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它创造自然界、人、人类历史。马克思深刻洞悉了上帝本体论的荒谬,并对其予以尖锐批判。

首先,上帝本体论的理论前提远离现实的人的劳动,是抽象思维的产物,没有事实根据,因而是荒谬的。针对上帝本体论炮制一个似乎能难倒普通群众的前提性问题——谁产生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马克思给予了有力回应:“我只能对你作如下的回答:你的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你设定它们是不存在的,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sup>[3]196</sup>。

其次,人类劳动的经验性、直观性无可辩驳地、最强有力地证明了上帝本体论的荒谬。“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sup>[3]196-197</sup>。人类在世世代代的劳动中找不到上帝存在的任何踪迹,反而有力证明了人和自然界的客观存在。

最后,在劳动中取得的自然科学新成果——地球构造说证实了上帝本体论的荒谬。18世纪80年代矿物学家阿·哥·韦尔纳的地球构造说证实:地球的形成是一个自我产生、自然发生的过程,与神明无关。这一实证科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使上帝本体论受到致命打击。“自然发生说是对创世说的唯一实际的驳斥”<sup>[3]195</sup>。

马克思不仅批判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以西方传统本体论为哲学依据的上帝本体论,而且彻底批判了西方传统本体论的典型形态——黑格尔本体论。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决定现实的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国家学说,本质上是建立在绝对精神本

体论的基础之上的。黑格尔把谓语、客体即绝对精神当做完全独立的、第一性的东西,当做主体;而把它们真正主体,即现实的家庭和市民社会当做第二性的东西、当做客体,其结果是绝对精神这一“神秘的实体成了现实的主体”<sup>[4]273</sup>。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黑格尔本体论的基本特征是“把实体(即作为黑格尔哲学的最高范畴和基石的绝对精神——引者注)了解为主体(即第一性的东西——引者注),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即‘绝对精神’能够完全独立地创造宇宙万物——引者注)。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sup>[3]280</sup>。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本体论予以多次批判,并指认他的本体论与黑格尔本体论有本质区别。黑格尔本体论主张绝对精神第一性、外部世界第二性,是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他主张生产劳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是唯物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sup>[5]22</sup>,意识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而是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对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的反映和再现,首次科学揭示了思维、存在与劳动之间的本质联系,从而大大超越了黑格尔本体论,也大大超越了西方传统本体论。

### (三) 马克思的本体论实质是劳动本体论

劳动、生产、实践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概念,这三个概念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均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而马克思劳动本体论中的劳动特指狭义的劳动,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它与马克思哲学中的狭义的生产、狭义的实践同义。“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sup>[3]580</sup>“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sup>[5]207-208</sup>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即物质生产活动之所以具有本体性、本源性的意义,根源在于劳动

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  
第一个前提,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化自然产生的第一个前提。这表明“劳动的基本方式是物质生产,即生产人类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劳动生产是人类社会的发源地”<sup>[6]4</sup>。离开劳动,人类不复存在,人与动物无法区别,人类历史不复存在,人化自然将退回到原来的蛮荒世界。马克思的劳动本体论得到恩格斯的高度评价。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的伟大理论贡献之一,是在人类历史中发现了“直接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构成基础”<sup>[7]601</sup>,这句话中的“直接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即为劳动。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本体并不神秘,它是现实的人所从事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简称劳动)。真正的人、真正的人化自然、真正的人类历史乃至各类科学理论最初都发端于现实的人的劳动活动中,并随之发展而发展。因而真正的哲学应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现实的人的劳动为本体建构哲学大厦,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本体论是劳动本体论,而不是其他形式的本体论,诸如实践本体论、社会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物质本体论等。其中,实践本体论缺乏充分的文本依据。因为“实践”概念仅在马克思哲学正式萌芽和诞生的标志性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集中出现,且主要从狭义实践即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使用,自此之后出现的次数大为减少,且多从广义上使用,泛指与理论活动不同的各种现实活动。社会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既缺乏文本依据,也缺乏原初性、本原性意义,因为社会、社会存在本质上是在劳动的基础上派生的、产生的。物质本体论是旧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在旧唯物主义者看来,物质是指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外部自然物,而马克思所理解的物质不仅指外部自然物,更指人类劳动以及经过人类劳动改造而形成的人化自然物和人类社会,因而物质

本体论尽管有原初性特征,但与人的劳动无关、与现实生活无关,并非马克思所理解的本体论。而劳动本体论既有原初性特征,也有充分的文本依据,因而更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 二、劳动创造了人:马克思将劳动本体论引入人学观

人的起源,人的最本质属性,人的自由的实现等问题是人学观的重要问题,马克思首次立足于现实的人的劳动,赋予人学观以崭新面貌。

### (一)人最初起源于劳动

人最初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自古以来是一个未解之谜。有人认为人自古就有,也有人认为人是神灵创造的,还有人认为人是绝对精神的产物,如此等等。马克思指出,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正确的看法是:劳动创造人,人最初起源于劳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人的起源观的批判足以体现这一点。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脱离人的生产劳动理解人的起源,认为人如同自然界一样均是绝对精神的产物是荒谬的。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词、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sup>[3]218</sup>。黑格尔脱离人的生产劳动侈谈自然界和人,并认为它们均产生于神秘的绝对精神是荒唐的,实际上“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sup>[3]196</sup>。概而言之,劳动创造了人,人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不断地生成自身、发展自身,因而劳动是人、人化自然产生的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 (二)人的最本质属性是劳动

人的最本质属性是什么,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最本质属性是政治属性,笛卡尔认为人的最本质属性是理性,黑格尔认为人的最本质属性是意识或宗教。与这些思想家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人的最本质属性是劳动;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的确

有很多,诸如政治性、理性、意识、宗教等等,它们的确是人所独有、而动物不具备的,但这些区别还不是人与动物的最本质区别。“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sup>[3]519</sup>这是因为政治、理性、法律、道德、宗教、意识等等属性均在劳动的基础上产生、发源,因而劳动是人的最本质属性。

### (三)劳动的不断发展决定人的自由的逐步实现

每个人都渴望自由,但如何真正实现自由,思想家们意见各异,马克思首次将劳动引入自由观,实现了自由观的革命性变革。

首先,人的自由的实现是由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人的自由不可能通过人的主观臆想摆脱外部束缚来实现,也不可能通过一厢情愿的美好理想来圆梦,人的自由的实现是由现有的劳动及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使然。实际上,“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sup>[8]507</sup>但自由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劳动及劳动生产力落后的历史阶段里,只有少数人获得自由,大多数人是自由的。诸如,在原始社会,因劳动生产力水平极低,每个人都依赖于氏族这一整体,因而每个人都极不自由。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力有一定发展,但发展还不够充分,其物质成果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于是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获得了发展的垄断权,他们压榨被剥削阶级的劳动成果,其结果是只有少数剥削阶级获得自由,而大多数被剥削阶级处于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他们“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sup>[8]507</sup>。

其次,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所创造的巨大劳动生产力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前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分

散、孤立、封闭决定其技术基础是保守的、落后的,受此影响,社会发展是缓慢而低速的,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大工业……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相互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sup>[5]560-561</sup>。究其原因在于,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想尽千方百计改进生产工具,迫使成千上万的雇佣工人进行集中的、高强度的生产劳动。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相互激励、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而使每个人的劳动技能迅速提升,这一切在客观上创造了超过过去一切世代之总和的巨大的劳动生产力,从而“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sup>[5]683</sup>。

### 三、劳动创造了人类历史:马克思将劳动本体论引入历史观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之前,对人类历史的看法上,唯心史观独占统治地位,其基本观点是主张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马克思首次将劳动引入历史观,主张物质实践即劳动决定社会意识,明确指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不同,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sup>[3]544</sup>。

#### (一)劳动是人类历史的前提条件

自古以来,历史学家们不了解物质生产即劳动在整个现实生活中第一位的、基础性的作用,从而导致唯心史观,而自然科学对物质生产即劳动予以足够的重视<sup>[5]211</sup>。马克思独具慧眼,吸取了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克服了历史学家们的局限,提出了如下卓越思想:人类历史要存在、要发展,首先必须有人存在,而人要存在、存活,每天必须有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即物质生活资料的供给,而物质生活资料的取得必须通过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即劳动。“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sup>[3]531</sup>,劳动由此就成为“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sup>[3]531</sup>。正是在此意义上,“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

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sup>[3]531</sup>。

#### (二)劳动决定其他一切社会活动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从事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诸如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军事活动、文化活动、教育活动等等。这些活动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人们并不清楚,剥削阶级思想家们趁机鼓吹政治活动决定其他一切活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破天荒地指出这些活动不是由政治活动来决定,更不是杂乱无章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一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取决于它”<sup>[3]575</sup>。

#### (三)劳动方式是区分不同经济时代的标志

不同的经济时代有不同的特征,其中最根本的特征是人们主要使用什么样的劳动资料进行劳动。与石制工具进行劳动相适应的是原始公有制经济形态,与手推磨进行劳动相适应的是封建主义经济形态,与蒸汽磨进行劳动相适应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sup>[5]210</sup>而劳动资料中生产工具最重要,因为它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决定着劳动对象的加工质量的优劣和数量的多寡,所以劳动资料中的生产工具“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sup>[5]210</sup>。

#### (四)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杂乱无章的,它如同自然界一样有其固有的规律,“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sup>[5]10</sup>。所谓经济的社会形态是指在劳动中产生的,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意指劳动和劳动方式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决定经济的社会形态必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其发展轨迹是:原始公有制经济形态—奴隶制经济形

态—封建制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共产主义经济形态,即“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sup>[9]592</sup>以及未来“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sup>[7]466</sup>即共产主义经济形态。

#### 四、劳动创造了人化自然:马克思将劳动本体论引入自然观

在马克思之前,人们通常认为人与自然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sup>[3]529</sup>。马克思首次将劳动本体论引入自然观,赋予自然观以新面貌。

##### (一)感性劳动是人化自然形成发展的最深刻根源

一方面,感性劳动是人化自然产生发展的最深刻基础,离开了感性物质生产劳动,人化自然界就会退回到原来的蛮荒世界。“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sup>[3]193</sup>“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sup>[3]529</sup>。另一方面,离开人的感性劳动的原始自然对人类而言没有实际意义。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自然观为例阐明了这一点。费尔巴哈强调自然界的客观性、先在性,这是其重要的历史功绩,但他所说的自然界实际上是人类诞生以前的蛮荒世界和人类的感性实践活动尚未触及的自然界,这种自然界远离人类社会,不能为人类的生存提供现实的物质条件和物质基础,对人类的发展而言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sup>[3]530</sup>。马克思进而指出,费尔巴哈自然观的局限根源于他的与感性活动无关的感性对象本体论的局限。“费尔巴哈……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他

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sup>[3]530</sup>。

##### (二)自然史和人类史统一于劳动

自然界与人类历史既有区别,更有联系,其联系的基础是劳动,因而自然史和人类史统一于劳动。正像一切自然物有自己的产生发展过程一样,人类历史也有自己的产生发展过程,而且人化自然史和人类史的产生发展是彼此交织、同时进行的。“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自身以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同时改变自身的自然”<sup>[5]208</sup>“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sup>[3]529</sup>。因此,“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sup>[3]516</sup>,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科学合理地改造利用自然,会促进自然和人类的双赢、共赢;反之,会招致两败俱伤、一损俱损的后果。

##### (三)自然科学的发展受制于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

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往往关注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对自然科学发展的作用,而不清楚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还有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而且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工业劳动与商业劳动决定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自然科学最初起源于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中;另一方面,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发展为自然科学提供了研究目标、研究动力、研究经验和各种物质材料,从而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sup>[3]529</sup>

#### 五、劳动创造了人的认识:马克思将劳动本体论引入认识论

在马克思之前,关于认识的本质、认识的

来源等重要问题上,哲学家们持有不同的看法。旧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消极被动的直观,唯心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纯精神的产物。马克思首次将劳动引入认识论,赋予认识论以崭新面貌。

### (一)认识起源于劳动

旧唯物主义认为认识是通过人的感性直观而产生的,主观唯心主义认为认识是人们头脑中主观自生的,客观唯心主义认为认识是上帝对人们的启示。马克思则指出认识产生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中,认识(意识)“最初是直接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sup>[3]524</sup>。无论是粗浅的感性认识,还是系统化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理性认识;无论是正确的认识,还是错误的幻象都不是人们头脑中主观自生的,而是产生于物质劳动中,是“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sup>[3]525</sup>。

### (二)认识的本质是对劳动过程的反映

人的认识(意识)绝不是消极被动的直观,也不是纯精神的产物,它本质上是对现实的劳动生活过程的反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sup>[3]525</sup>。

### (三)劳动实践的社会性决定认识的社会性

认识(意识)和语言一样也是由于劳动实践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劳动实践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它需要人与人之间相互分工协作才能完成,劳动实践的社会性决定认识(意识)的社会性。“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sup>[3]533</sup>。“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sup>[5]382</sup>。

### (四)理论对立的根源是劳动实践中的矛盾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理论对立是由于思想家们看问题的视角或所处的立场等不同

引起的,因而只要立场一致、视角相同,理论对立就可解决。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理论对立的深层根源是劳动实践中存在的客观矛盾引起的,因而只有当劳动实践中的矛盾得到了解决,理论对立才会得到彻底解决,否则不同理论之间的论争就会持续下去。“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sup>[3]192</sup>。“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sup>[3]501</sup>

### (五)劳动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根本标准

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是认识论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其中有代表性的主张是:只有用人们普遍公认的重要理论或权威观点才能检验另一种理论或认识是否是真理。马克思断然否认这一看法,他指出:认识的真理性的检验标准不可能是某种重要理论或某种权威,而是劳动实践。只有经受了广大人民群众劳动实践的检验是正确的认识才是真理,否则就是谬误。离开劳动实践来谈论某种认识是真理或谬误,如同中世纪的、抽象的经院哲学问题一样纯属无稽之谈。因为“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sup>[3]526</sup>。

### (六)劳动实践的发展决定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

劳动实践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人的认知能力、感知能力的高低均受劳动实践的深度和广度所制约。从历时态来看,与粗陋的生产工具为标志的原始社会的生产劳动相适应的是纯粹的畜群意识(认识),与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为标志的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相适应的是理论化系统化的哲学、政治、法律、道德等思想。

从共时态来看,人类劳动的局限性决定人的认识能力、感知能力的狭隘性,“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sup>[3]192</sup>。随着人类劳动的不断发展,其丰富性推动并决定人的感知能力、认识能力的全面性,“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sup>[3]191-192</sup>一言以蔽之,人们“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sup>[10]145</sup>。

(七)认识形成的具体过程是劳动过程中的感性具体—思维抽象—思维具体

认识的形成过程是认识论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认识论领域的大难题。康德首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人有感性、知性、理性三种先天的认识禀赋与能力,由此形成感性认识、知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等由低到高的认识形式和阶段。康德离开人的劳动过程孤立地考察人的认识的形成过程,最终导致不可知论。黑格尔认为认识的形成过程是绝对精神自身的产生过程。黑格尔离开劳动过程抽象地考察认识的形成过程,最终导致神秘主义,“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sup>[10]25</sup>。马克思首次将劳动引入认识的形成过程,扬弃了康德和黑格尔的上述观点,科学解答了认识的形成过程:第一步是人们从劳动过程中通过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接触、了解到大量的具体事物,形成生动、形象的感性认识,即感性具体,感性具体“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sup>[10]24</sup>。第二步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通过抽象思维将这些具体的感性认识上升到一般、抽象的理性认识,即理性抽象,理性抽象是“一些最简单的规定”<sup>[10]24</sup>。第

三步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进一步将第二步形成的理性认识运用到具体事物之中,修正、完善、深化第一步产生的感性认识,同时修正、完善、深化第二步产生的理性认识,最终形成关于具体事物的更深刻、更全面、更系统的理性认识,即思维具体。这种思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sup>[10]25</sup>。简言之,认识产生的具体过程是:劳动中的感性具体—抽象思维—理性具体的过程。

## 六、落后劳动方式创造了宗教:马克思将劳动本体论引入宗教观

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首次提出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改变了长期以来思想家们关于宗教的神秘主义、蒙昧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解读,将宗教研究推进到新的水平。马克思首次将宗教的产生、发展、演化置于劳动基石之上,大大推进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引起了宗教观的革命性变革。

(一)宗教产生的根源是劳动过程中的矛盾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将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将宗教世界的本质归结为世俗世界的本质,改变了基督教神学关于上帝创造人,宗教世界创造世俗世界的荒谬主张,因而有其合理性。但他就此止步不前,没有进一步追问更为重要的问题——世俗世界分裂出宗教世界的根本原因,即宗教产生的真正根源何在,以及如何克服和消灭宗教。费尔巴哈未能完成的这些任务由马克思完成了。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sup>[3]505</sup>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因而不可能找到宗教产生的现实根源。宗教产生的深刻根源在于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是落后的劳动方式和以此为基础的狭隘的社会关系使人们在现实世界看不到希望,于是从主观上虚构美好和谐的“世外桃源”以寻找精神慰藉,从而产生关于现实世界的虚幻的、颠倒反映——宗教。“如

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sup>[3]524</sup>进而言之,“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即宗教世界——引者注),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sup>[3]500</sup>。

### (二) 物质生产劳动决定宗教活动

长期以来,剥削阶级思想家鼓吹宗教活动、政治活动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宗教活动、政治活动决定现实生活而不是相反。19世纪40年代中期德国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格律恩就持这一观点。马克思指出,格律恩的这一谬论是一个“古老而陈旧”错误命题,其结果是必将陷入唯心主义。“如果宗教和政治被当作物质生活关系的基础,那末在最终的审判中一切都会归结为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即归结为人关于自身的意识”<sup>[8]609</sup>。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劳动是最基本的物质活动,它不仅决定宗教活动,还决定政治活动、法律活动、道德活动等其他一切活动。“一定的工业关系和交往关系……必然地和……一定的宗教意识形式相联系”<sup>[8]162</sup>。

### (三) 共产主义的生产劳动将使宗教消亡

宗教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可能永远存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即“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与此相适应的宗教是“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sup>[5]97</sup>。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劳动是普遍性的商品生产,“生产者把他们的

产品当做商品,从而当做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做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sup>[5]97</sup>,与此相适应的宗教是“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sup>[5]97</sup>。到了共产主义阶段,生产劳动处于有计划的、明白而合理的控制之下,宗教将会消亡。“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sup>[5]97</sup>

### [ 参 考 文 献 ]

- [1] 俞宣孟. 本体论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2] 杨适. 古希腊哲学探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6] 陈先达. 劳动观点的重要性[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1-31(4).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王遐见)

# 人机协同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变革： 发展机遇、模式审视与隐忧规避\*

秦在东 黄丽辉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0)

**[摘要]** 智能时代的到来,使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主体与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智能技术正从“工具性介入”走向“场域性嵌入”,在催生思想政治教育迈向虚实融合、多主体协同与情感互动新阶段的同时,也带来不可忽视的隐忧,表现为算法“投喂”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流叙事,数据量化异化偏离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本质,教育主体悬置冷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温度。为此,立足“教育为本,技术为用”,锚定根本原则,筑牢智能教育的价值根基;规制数字资本,引导教育场域的良性生态;赋能核心主体,明确人机权责的协同边界;创新内容生态,适配人机协同的教育资源,打造兼具认知深度与情感温度的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场域。

**[关键词]** 人机协同; 智能技术; 思想政治教育场域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2-0018-09

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场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要“把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创新智能学伴、智能教师等人机协同教育教学新模式”<sup>[1]</sup>。在政策与技术双重驱动下,学习空间从传统课堂延伸到虚拟平台、社交媒体与算法推荐系统构成的混合环境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依赖固定场所、线性传播与单向灌输,逐步向“多主体共构”的开放型教育生态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的场域既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的空间,也是教育者、受教育者、参加者、教育环境、教育载体、教育方法等各要素之间存在的关系网络<sup>[2]</sup>。智能技术的深度介入,在

提升教育效率、扩展覆盖范围、增强互动性的同时,带来人类生活与工作环境的巨大变化,也带来了主体性模糊、价值引导弱化、信息茧房固化等多重风险。在此背景下,亟需在“人机协同”的整体框架下,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变革的机遇与风险,推动其实现从工具适配到价值涵育的范式转型。

## 一、发展机遇:人机协同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变革的图景展现

美国知名评论家布雷特·金曾在《智能浪潮:增强时代来临》中指出,今天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已经重新定义了人类社会,正走向智能增强时代<sup>[3]12-26</sup>。“教育系统正处于从被动接受外部变化转向主动适应并推动内部变革的关键阶段。”“意味着教育体系不仅仅是

\*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融入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项目编号:19JZD047)。

[收稿日期] 2025-11-16

[作者简介] 秦在东,男,湖北宜昌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丽辉,女,江西赣州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技术和资本等外部驱动的应变者,更是主动变革的主导者”<sup>[4]</sup>。智能技术进入教育场景,既改变了知识流动的方向,也影响了价值引导的结构,成为新的“场域力量”,共同塑造思想生成的社会生态。

### (一) 虚实空间融合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新场景

随着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引入虚拟情境构建技术,为学生营造可探索、可交互、可共创的沉浸式学习场景”。<sup>[5]</sup>智能技术加持下触发多个场景的联动效应,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物理课堂走向多时空的教育场域。虚拟课堂、智能平台、数字孪生校园等场景,使教育突破时空限制,实现随时互动、实时生成。例如,基于 ChatGPT、文心一言等大模型的问答平台,能够即时生成政策解释与思想引导内容,创新了教学传播结构。智能技术赋能的学习场景具有可探索特征,通过构建开放性、多维度的模拟环境,支持学习者自主探究,在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中构建个性化知识体系;智能技术赋能的学习场景具有可交互特征,借助自然语言处理,实现学习者与内容、环境及虚拟角色的思想碰撞与道德共鸣,增添了思想引领过程中的活力;智能技术赋能的学习场景具有可共创特征,依托智能内容的构建与逻辑推演能力,引导学习者参与知识生成,深化场景育人效果。

“长期以来空间是作为教学的‘背景性存在’而被人们所认识 and 理解的,侧重于对教学空间物质属性或者内部物质表现形式”<sup>[6]</sup>,其构建既依赖于特定的时空边界与物质载体,也依赖于其中所承载的师生交往、知识传递与情感交流等教育实践。传统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空间是由课堂所主导,是指思政课教师在利用固定的教室、讲台等物理环境,构建起一个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蓝本、以知识单向传授为特征的教育活动场域。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发生空间延伸至虚实融合的崭新维度。一是助推思想政治教学空间将单向的理论灌输转变为双向的对话启迪。通过虚拟仿真技术重访历史现

场或推演社会现象,学习者得以在具身体验中感知理论的现实力量,实现从知其然到探其所以然的飞跃,有效促进了价值认同从外在灌输向内生信仰的转化。二是助力引导学习者从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意义建构者。学习者能够借助智能技术梳理历史脉络,自主探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的逻辑关联及其当代价值,在追问与验证中深化对“何以必然”的理解。

### (二) 多元主体协同培育思想政治教育新关系

伴随着大语言模型及智能体技术的深度整合,社会互动模式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从传统的“人际互动”演变为“人机共存”乃至“人机共育”的形态,这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发展趋势。课堂这一育人主阵地,其教学活动结构也正从“师—生”二元向“师—生—机”三元转变,为实现人工智能驱动的大规模个性化教学提供切入点<sup>[7]</sup>。人机协同视域下的教育不再是“教师单向传授、学生被动接受”的单场景结构,而是“教师—学生—智能体”三元互动系统。智能技术在其中兼具认知助理与关系搭建者的双重角色。教师不再是唯一的知识源,而成为价值共创的引导者;学生从灌输对象转变为能动建构者。

传统意义上,教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者,凭借其理论权威、人格魅力与现场感染力,在价值引导与思想启迪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智能技术作为具备认知参与能力的新行动元,正推动形成教师、学生与智能体多元协同、双向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机共育新关系。一是实现“师”角色的战略性升级与“机”的功能性互补。智能系统能够动态地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为教师提供精确的教学建议和资源匹配方案,从而将教师从繁琐的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专注于更高层次的教学情境创设、人机协同活动的引导以及深层次的价值挖掘。如此不仅实现了人机功能的优势互补,还促使教师的角色从知识传递者转变为价值塑造者和思想引领者。二是促进“生”的主体性深度激活与“机”的赋能性互

动。在“机”的支持下,一个由学生和机器共同参与的双向学习共同体得以构建。借助苏格拉底的启发性对话、沉浸式的情境模拟以及即时的学习反馈,能够有效激发学生主动进行意义探索。例如,借助人机协同的认知推演功能,可以组织学生与虚拟的邓小平“南方谈话”情境再现,在动态追踪中深入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逻辑,从而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可感知的具身化的历史体验。

### (三)情感计算技术再造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

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力根植于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机”的情感计算与语义理解技术,使得虚拟交互具备一定的情绪响应与心理陪伴功能。但情感共鸣的本质依然属于“人”。在人机协同的新教育场域中,教师的主导性地位未被削弱,反而更加凸显。教师得以借助智能技术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的情况状态,这意味着技术成为感知与理解的延伸,让教师能更及时地察觉、更精准地呼应学生的情感需求。

情感计算作为人工智能实现“情感智能”的关键路径,其通过识别、解读与响应人类情感状态,为人机交互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温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与实效性,不仅在于“以理服人”,更在于“以情感人”,依赖于师生间真诚的情感共鸣与心灵互动。以情感计算为核心的新一代人机交互技术,正通过精准的情感感知与适配性的情感响应,打破传统互动中情感信号依赖主观判断、难以实时把握的局限,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互动从经验判断走向数据支撑,从群体泛化走向个体关怀,实现情感育人的精准化与深度化。

思政课教师从情感的直接观察者转变为情感育人生态的深度引导者,受教育者则从情感的被动接收者转向情感的主动表达者。情感计算技术为构建这一新型互动体验提供了双重路径:一是为思政课教师担当“智能导师”提供精准的情感循证支撑。情感计算技术通过面部表情分析、语音情感识别与文本情绪解析等多模态数据融合,这使得思政课教师

能够超越个体经验局限,精准把脉学生的集体情绪氛围与个体情感需求,为其在价值引导、课堂互动中提供决策依据。例如在识别到普遍性理论困惑时及时调整讲解策略,在感知到个体价值动摇时给予及时关怀,从而从“传授知识的教师”转型升级为洞察心灵、善解疑难的“智能导师”,显著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中情感互动的深度与效能。二是扮演受教育者的“情感陪伴”,为其提供即时的情感支持。智能系统能够基于对学习者的情绪状态的判断,在其面临认知负荷、价值冲突或情感低谷时,主动提供共情性的语言鼓励、适配性的内容推送或放松性的心理调适建议。这种持续在线的、非评判性的情感支持,有助于缓解学习焦虑,构建安全积极的心理环境,让受教育者在被理解与尊重的体验中,更愿意敞开心扉、接纳理论,为实现价值观念的深度内化奠定坚实的情感基础。

由此可见,情感计算技术的深度融合,其终极目标并非以机器情感替代人类关怀,而是通过赋能与增强,重塑一种更具洞察力、响应力和支持性的师生互动新范式。它使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情感互动变得可感知、可量化、可支撑,最终推动价值引领从知识层面的“知其理”深化为情感层面的“动其心”。

## 二、模式审视:人机协同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变革的隐忧透析

政策大力推动以“赋能”和“增效”为目标的“人机协同”教育教学新模式,既重构了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结构,也滋生了隐忧。正如尼尔·波斯曼所言:“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sup>[8]47</sup>

### (一)算法“投喂”挤占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流叙事

算法作为一种新兴的行动者,凭借其强大的数据资本逻辑,给传统教育场域中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带来挑战。思想政治教育是承载主流价值叙事、巩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系统性活动,其话语的权威性源于叙事体系的完整性、价值导向的一致性与传播过程的可控性。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媒体平台和资讯终端为了获取更高的点击量,通常采用‘算法+推荐’模式,即通过大数据,根据受众兴趣偏好和浏览历史有选择地推送信息,引发数字信息传播结构变化及‘理性认知剥夺’风险”<sup>[9]</sup>。智能算法在实现信息定制化、精准化“投喂”的同时,也潜藏着窄化受众信息视野的风险,导致其逐渐固守于封闭的价值体系,乃至不自觉地算法所营造的过滤标准误认为客观真实。

在此情景下,教育政策虽然推动“大规模因材施教”,倡导依托算法实现个性化育人,但其技术逻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宏大叙事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究其本质,算法推荐机制通常基于受众既有信息偏好进行推送,结果具有价值窄化倾向。“为增加用户黏性,资本逻辑下的智能主体奉行‘用户至上’的话语生成机制,在话语生产过程中更加注重用户的需求偏好。”<sup>[10]</sup>这种以“投其所好”为核心的技术逻辑,本质上与思想政治教育旨在打破个人认知局限、强化价值关怀的目标相冲突。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集体主义精神和历史使命感为核心任务,其叙事体系具有超越个体经验的宏大性与整体性。当算法将学生禁锢于个人兴趣构建的“信息茧房”时,便系统性地削弱了其对国家命运、民族复兴等宏大叙事的话语场域,使其难以形成对集体价值目标的深刻理解和情感认同,最终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传递上的“失范”。

算法推荐机制存在工具理性膨胀倾向,侵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价值逻辑。“人工智能时代精神生产的自主性,尤其是模型和算法的自主运行,让人工智能能够自动画画、自动做视频,甚至能够比人更懂人,能够进行算法偏好推送等。”<sup>[11]</sup>这种“推送偏好”本质上与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理论深度、价值崇高性和思想严肃性的“价值逻辑”相冲突。思想政治教育以系统传授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培育崇高理想信念为使命,其内容生产与传播必须坚持价值理性优先原则。当算法持续推送解构严肃理论的娱乐化解读、消解崇高信仰的浅表化

内容时,不仅碎片化了学生的理论认知体系,更在不断强化的情感刺激中钝化了其深度思考能力,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从“思想启迪”降维为“情感消费”、从“价值塑造”异化为“流量追逐”的渊藪,最终导致育人目标的“失焦”。

算法推荐机制潜藏着符号权力的隐性支配,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主导权。算法的筛选和排序机制,以一种看似中立、科学的方式,定义了什么是“重要”、“相关”和“正确”的内容。这实则是一种更隐蔽、更强大的价值导向,可能悄无声息地挤压主流价值观的传播空间。“AI算法不仅能刻画用户当前的状态,更能基于历史数据和行为模式,高精度预测其未来的行为倾向”<sup>[12]</sup>。这种以技术科学性为外衣的符号运作机制,本质上与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价值显性、立场鲜明的意识形态传播原则形成结构性矛盾。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掌握“何为重要”“何为正确”的定义权与阐释权,这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基础保障。当算法将主流价值观内容置于次要位置或进行去政治化解读时,实质是通过技术秩序重构了话语秩序,在无形中削弱了教育者的话语权威,窄化了主流价值的传播通道,最终导致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隐性流失”。

## (二)数据量化异化偏离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本质

经济资本通过技术手段侵入教育场域,试图将文化资本简化为可计算的指标,导致场域目标的扭曲。从教育本质而言,育人是基于人的整体性、发展性和社会性的复杂过程,强调在真实情境中实现价值引导、情感共鸣与人格塑造的有机统一。智能技术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其强大的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正将这一过程简化为可计算、可监控的数据指标体系,导致育人活动从“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实践异化为“以数据为中心”的技术管理,偏离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

数据量化可能导致思想政治教育陷入“人的空场”困境。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劳动时深刻指出:“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

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sup>[13]537</sup>这一论断精准揭示了当技术理性过度膨胀时,人类造物反而可能成为支配人类的异己力量。智能技术将学习行为、互动频率等数据点构建精细的学生数字画像,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那些本应在师生互动中直接感知的情感温度、价值困惑与精神成长,都被转化为冷冰冰的可视化报表。这种数据化表征虽在形式上提升了效率,却使教育者不自觉地被数据所支配,将注意力从活生生的“人”转向抽象的“数”,从充满不确定性的成长过程转向确定性的数据表现。数据永远无法捕捉教育中最珍贵的生命互动与精神交往,这些只能在面对面的共情理解与价值唤醒中实现。构建数据与育人之间的张力平衡,目的是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坚守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核心地位,避免教育过程在数据崇拜中被异化,确保育人实践始终以培养自由而完整的生命个体为根本旨归。

数据评价体系可能导致受教育者陷入“表演性认同”的异化状态。马克思在揭示人的异化现象时曾深刻指出,在特定社会关系下,“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了对人类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sup>[13]163</sup>。这一论断精准预见了在数据驱动的评价体系中,人的精神成长可能沦为对外部指标的被动迎合。如果数据驱动构建起以量化指标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模式,学生将很大程度上算法惯性标准化,并规避独立思考机会,使得“教育有可能沦为社会复制的又一个工具”<sup>[14]2-3</sup>。数据评价只能捕捉外显的行为痕迹,却无法触及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价值判断的成熟度等深层素养。

### (三)教育主体悬置冷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温度

随着情感计算等智能技术的持续演进,部分教育主体短时间内无法适应人机协同场域中的新惯习,其位置可能被技术暂时架空或边缘化。“当人与机器建立了情感联系时,人工

智能已变为技术情感化和情感技术化的叠加‘物’”<sup>[15]</sup>此时在对情感关系的意义、价值等进行分析时,传统的理论便会显现出解释的局限性。这不仅是因为情感关系的形式新及主体新,而且是因为情感关系的情动流变新,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一转变虽增强了人与机器的“亲和性”,却也潜在地重构了情感关系的联结路径,尤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师生互动带来深层影响。

一是教师角色的“去技能化”导致价值引领的虚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作为教育的主导者,其价值不仅体现在知识传授,更在于通过敏锐的观察、即时的互动和深度的思辨,在具体情境中完成价值引导。然而,智能技术能够自动生成教案、精准推送内容、即时解答疑问时,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课堂应变能力 and 价值判断能力这些核心专业技能面临着被技术替代的风险。马克思曾深刻指出:“机器迁就人的软弱性,以便把软弱的人变成机器。”<sup>[13]226</sup>这一洞见在教育领域正逐渐得以证实:教师从充满创造性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被降格为执行算法指令的“技术操作员”,其主体性在技术的“赋能”中被无形悬置。这种去技能化不仅是专业能力的退化,更是教育者角色的异化。当教师沦为算法的执行者,思想政治教育所特有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引领也将随之虚化。

二是教育过程的“程序化”导致情感联结的弱化。思想政治教育是有温度的教育,依赖于师生间的情感连接、言传身教和人格感染。人机协同的高效率可能以牺牲教育的温度和情感互动为代价,使得价值观念的传递变得冰冷和机械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魅力在于其是有温度的教育,这种温度源于师生之间真实的情感互动、言传身教和人格感染。它是“亲其师,信其道”的情感认同,是在目光交汇、语言互动和思想碰撞中建立的心灵联结。然而,在人机协同对效率的极致追求中,这种宝贵的情感联结正面临被解构的危险。当智能导师将精准内容推送时,教学过程中那些即时的、生成性的、充满人文关怀的情感互动都

被技术理性的高效率所取代。教育变成了一场由数据驱动、按预设程序执行的冰冷流程,师生关系被简化为信息传递与反馈的技术性交换。这种情感联结的断裂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从充满生命律动的“情感场域”异化为虽然高效流畅但却冰冷无感的信息处理系统,其育人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 三、隐忧规避:人机协同态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变革的优化路向

人机协同背景下,被技术重构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不能任其自由发展,而必须进行一场自觉的、系统性的变革。这在一过程中,智能技术作为辅助角色,应以巩固意识形态主导权为根本、以“教育为本,技术为用”为基本原则。

(一)锚定根本原则:筑牢智能教育的价值根基

智能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绝非价值无涉的技术过程,而是一场关乎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深刻变革。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克服原有惯习的牵掣,确立其运行的“元规则”,确保技术的浪潮始终沿着正确的航道奔涌,坚定不移地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使命。

一是坚守政治主导原则,坚守智能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智能化转型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非单纯追求技术效率或工具理性。这是教育场域不可动摇的“宪法”,是检验一切技术应用成败得失的试金石。技术的敏捷性、算法的精准性,必须无条件服从于政治立场的坚定性与价值导向的正确性。要深刻认识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介入,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斗争在新前沿的延伸。因此,必须将主流价值观作为核心指令深度嵌入技术设计与应用的全过程,确保生成的内容、推送的信息、创设的情境,始终与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同向同行,坚决防范算法偏见和技术黑箱可能带来的意识形态“暗礁”,使智能教育场域成为传播科学理论、筑牢信仰根基的坚强阵地。

二是把握教育本位原则,回归智能教育的

育人初心本源。必须始终坚持育人本位,旗帜鲜明地反对“技术本位”或“效率至上”的倾向。技术的融入与赋能,必须严格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这三大基本规律。任何技术应用,无论其展现出的数据处理能力多么强大、交互体验多么炫目,一旦被证实偏离了“立德树人”的轨道,干扰了学生自主建构价值认知的过程,或削弱了教育者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主导作用,都应被果断修正、调整乃至摒弃。例如,算法驱动的“信息茧房”可能阻碍学生接触多元观点、进行批判性思考,这与思想政治教育开阔视野、明辨是非的目标背道而驰;过度依赖虚拟交互而替代真实的人际交往与情感共鸣,更会抽空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底蕴。因此,智能技术的角色定位,必须是增强而非替代教育规律,是赋能而非“绑架”育人过程。

三是落实公平保障原则,匡正智能教育的普惠发展导向。马克思主义对公平的追求,深刻体现在教育公平中,“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sup>[16]53</sup>因而,必须将“促进教育公平”这一庄严的政策承诺切实转化为智能教育场域构建的实践自觉与行动底线。这就要求在推进“机”+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加强顶层设计与资源统筹,通过建设共享平台、开放优质资源、开展精准帮扶等措施,促进智能教育资源和能力的均衡布局。同时,在技术设计与应用层面,也需注重普惠性与可及性,避免设计过于复杂、成本高昂的技术方案,确保不同背景的学生都能平等地享受技术赋能带来的教育红利,让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真正成为促进社会公平、助力每一位学生成长成才的助力器。

(二)规制多元资本:引导教育场域的良好生态

必须对涌入的新资本进行有效的规制与引导,防止破坏场域原有的良性生态和竞争逻辑,确保资本为“我”所用。

一是规制数字资本,捍卫教育主权。数字

作为智能时代的新型生产资料,其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归属直接关系到教育主权的完整性。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与资本的基本原理,将数字资本的配置权牢牢掌握在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教育主体手中,确保数字要素在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而非沦为侵蚀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异己力量。这深刻指明了数字要素必须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为塑造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提供有力支撑。在原则层面,要确立“数据主权与教育自主”的根本立场,将数据资本的开发利用置于教育主权框架之下,明确教育数据特别是涉及学生思想动态、价值取向等核心数据的国家属性与教育属性,从根本原则上防范数据资本的无序扩张。具体而言,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教育领域数据分类分级指南,对涉及学生价值观、政治态度等敏感数据实施最高级别的保护,确保数据开发利用始终在安全、合规的轨道上运行,筑牢教育主权的数据基石。

二是赋能算法资本,注入红色基因。算法已成为影响甚至塑造学生认知环境的关键力量。不能被动地等待算法技术的自然演进,而必须主动作为,进行前瞻性的价值干预。要大力支持和引导研发内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红色算法”或“正能量模型”,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算法能够识别和执行的逻辑规则,从源头上确保智能推送、内容生成的价值安全性。AI能智能筛选、整合、精准推送与学生兴趣、需求、思想动态高度相关的榜样故事、理论解读、实践活动等优质思政内容,提高信息触达率和吸引力,对抗“信息茧房”。最终实现对算法决策过程的有效驾驭与监督,确保其输出结果符合育人规律与政治要求。

三是重塑象征资本,端正评价导向。这是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中,象征资本作为一种通过承认和认同而获得的合法性权威,深刻影响着场域内行动者的实践逻辑与价值取向。在智能化转型过程中,若评价体系过度侧重技

术效率指标,如平台活跃度、资源生成量、互动响应速度等,而弱化对价值引领实效、理论阐释深度与学生认同程度的考察,实则是在象征层面默许了“技术效能”对“育人本质”的替代,这将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的竞争逻辑发生根本性偏移。因此,必须主动重塑象征资本的授予体系。需要强化激励引导,树立“技术向善”的典型范式。通过大力宣传和推广智能技术,有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与说服力的优秀案例,为场域内所有行动者提供清晰的行为参照。此举旨在将象征资本转化为引导场域发展的强大信号,驱动教育者及学校管理者等多元主体在运用智能技术的同时始终锚定育人初心,共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从“技术竞赛”的异化轨道回归“立德树人”的价值本位。

### (三) 赋能核心主体:构建人机权责的协同边界

场域的生命力根植于其核心行动者的能动性实践,即帮助其获取多元资本,适应人机协同新惯习,从而重新稳固其优势位置。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特殊场域中,从规则层面厘清人机协同的权责边界,维护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是抵御技术异化、确保育人方向的前提。这要求我们不仅要从能力层面实现主体赋能,更要从规则层面厘清人机协同的权责边界,构建“以人为主导、以机为赋能”的良性互动新秩序。

一是赋能教育者,锻造“政治强、技术精”的先锋队伍。面对智能技术作为新行动者入场带来的角色挑战,思政课教师亟需完成从“技术使用者”到“智慧育人者”的转型升级。这需要通过系统化的数字素养培训,不仅使其掌握运用 DeepSeek 等工具进行教学设计、资源生成与学情分析的操作能力,更要提升其辨识算法偏见、防范意识形态风险、在复杂信息环境中进行价值澄清的批判能力。其目标是培养教师将政治判断力与技术洞察力融会贯通的新型“智慧惯习”,使其在人机协同中始终成为教学情境的创造者、价值对话的引导者与育人方向的把握者,营造符合主流意识形态

的交互环境文化氛围,从而在人机协同的场域中巩固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是提升学习者,培育数字时代的批判性公民,筑牢场域的价值根基。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算法推送、虚拟交互成为常态的智能环境中,必须着力增强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自主性与批判力。这需要将算法素养教育融入思政课程,帮助学生理解推荐机制的原理与局限,认清“信息茧房”与“流量逻辑”的潜在风险。同时强化批判性思维训练,引导其在对话多元信息中保持清醒的价值判断,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清醒的“信息辨析者”和主动的“知识建构者”。如此,才能使学生免于被技术奴役,真正成为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独立人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三是明确人机协同新规则,明确权责伦理边界,保障场域运行的秩序与安全。技术的无序扩张必然带来责任的模糊与伦理的失范。必须通过制度建构,为“师—生—机”三元互动划定清晰的跑道。当务之急明确界定在教学设计、内容生成、课堂实施、效果评估等全流程中,哪些环节可由智能技术辅助,哪些决策必须由教师做出;同时建立清晰的责任追溯机制,明确当生成内容出现偏差或教学决策产生争议时,教师、技术提供方、学校等各自的责任归属。这套规则体系是实现人机优势互补、防范技术风险的操作基石,旨在确保技术创新始终在合规、可控的框架内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 (四) 创新内容生态: 适配人机协同的教育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的良好生态需要优质、适配的内容支撑,其关键在于主流话语体系的高效供给与流通适配。人机协同不仅重塑了教育形态,更迫切要求推动教育内容的生产模式与话语形态进行创新性变革,以生成一种既能生动发挥技术优势,又能承载教育内核的新型内容体系。

一是在内容生产层面,推动核心教学内容供给知识模组优化,实现供给的体系化与结构

化。面对算法“投喂”可能挤占主流叙事,单靠外部算法规制,不足以应对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变革,更需要从内容供给的源头进行革新,使主流价值本身成为易于被智能技术识别、处理与正向推广的优质“数据资本”。这意味着要束缚超越传统教材的束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核心内容进行创造性转化。具体而言,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数据资源库”,将庞大、抽象的叙述解构为具体的、可标记的知识模组。例如,将“共同富裕”理念分解为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实现路径和相关故事等标签化模组;将“爱国主义”精神具体化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坐标、代表性的英雄人物、保家卫国成就以及相应的行为规范等多维标志。每个模组均有智能技术识别支撑,可根据教师、学习者及其他教辅人员的需要提供适配素材。这一过程,实质上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转化为可感知、可协作的知识单元,以确保主流价值“在场”,且以主导地位抵制碎片化、娱乐化信息对意义空间的侵蚀。

二是在内容传播层面,创新人机协同的叙事形式,实现教育供给的适配性与趣味性。在虚实融合、人机共生的新场景中,学习者形成了相适应的新惯习。这并非意味着将内容创作完全交由机器,而是构建“人—机—人”协同的新模式。其中,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的价值把关者和活动主导者,负责设定叙事主题、核心思想与情感基调。智能技术作为认知助理和关系搭建者,基于“思想政治教育数据资源库”,将体系化、结构化的教学素材,在教育者的指引下,快速生成多种形态的内容初稿。例如,围绕“弘扬工匠精神”这一主题,可协同生成深度解读文章、沉浸式虚拟现实体验脚本、系列动漫短视频、互动式数据新闻、具有对话能力的数字榜样人物等。这些“新产品”在价值内核上高度统一,但呈现形式丰富多样,能够适配不同场域和不同受众的需求。这种基于特定主题进行多样化呈现的内容生成策略,实际上是运用技术手段对主流意识形

态进行的一次升级,使其在传播过程中不仅保留了思想的深刻性和理论的严谨性,还增添了形式的新颖感和趣味性,从而有效对抗因算法偏好可能导致的“信息茧房”效应或意义稀释,让正能量贯穿于人机协同的每一个环节。

三是在生态维护层面,建立“反馈—迭代”机制,实现教育供给的精准化与智能化。人机协同场域的优势在于,它不仅能单独地“教”,更能通过持续的数据交互“感知”教学效果。为了避免数据量化异化带来的偏离育人本质的风险,关键在于建立一套以育人效果为核心导向、人机协作的反馈分析与内容迭代机制,使内容生态从数据库升级为具有感知能力的智能体。一方面,教育者需要与机器协同,对教育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分析,识别出教学内容传播过程中的难点、疑点及情感共鸣点。例如,通过分析数据会发现,某种特定的叙事框架更易引发青年群体深入探讨,或某个理论知识点在多轮对话后仍存在普遍的理解偏差。基于这些发现,教育者及其他教辅人员便可以进行专业的调整和优化。另一方面,基于研判和反馈成效,教育者要及时对内容进行精准优化迭代。对于传播效能好的知识模组和叙事形式予以强化和推广;对于传播中总是引发歧义的内容,及时反馈至供给知识模组中,生成更鲜明的解释性内容或辅助案例。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政策文件为我们指明了人机协同的光明前景,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正由“封闭课堂”走向“开放场域”,由“单一主体”走向“多元协同”。智能技术的出现,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终结,而是其重生的契机。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将是一个“人机共育、智能共创、价值共生”的生态系统。未来需要在技术浪潮中守住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用人工智能的理性服务于人的精神觉醒与价值自觉,培养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 参 考 文 献 ]

-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5-08-27(4).

- [2] 刘爱玲.互联网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的转换与重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6):135-138.
- [3] 布雷特·金.智能浪潮:增强时代来临[M].刘林德,冯斌,张百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 [4] 黄荣怀.人工智能大模型融入教育:观念转变、形态重塑与关键举措[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14):23-30.
- [5] 党同桐,王焕景.人机共生时代师生情感共同体场景化建构向度与路径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25(9):63-69.
- [6] 马飞.从实体到关系:重申教学空间的内涵、特征与发展进路——面向数智时代的思考[J].电化教育研究,2024(7):64-72.
- [7] 谢幼如,陈薇,邱艺.人工智能赋能高校课堂教学重构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25(10):5-13.
- [8] 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 [9] 王海威.人工智能诱发隐性意识形态话语风险的逻辑机理及化解策略[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4):124-133.
- [10] 谢俊,吴阳琴.智能算法推荐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挑战及其应对[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144-154.
- [11] 刘伟兵.智能思政:人工智能时代精神生产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25-34.
- [12] 彭焕萍,刘容江.AI重塑媒介生态:伦理困境、素养跃迁与治理路径[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6):161-171.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 格特·比斯塔.教育的美丽风险[M].赵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15] 韩伟,陈曦.人工智能、情感计算与人机“共生”[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8):95-104.
-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王遐见)